

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

张振谦

摘要: 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南宋时期的宫观官制度既是反道学的工具,又为理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当时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大多数士人拥有领任宫观官归乡里居的经历,这无疑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宫观官制度为建州地域文人聚合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冲佑观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宫观官的道观,道教名山武夷山是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和朱子理学诞生、发展、成熟的大本营。刘子翬生命的最后 17 年 5 次奉祠,闲居建州崇安,读书创作和讲学授徒成为他最重要的两项日常精神活动。朱熹一生长期领任宫观官,共计 20 余年。宫观官制度为朱熹的理学杰出地位与文学创作成就的取得提供了经济支撑和时间保障,他奉祠期间营建和书写的武夷精舍可视为二者发生联系的重要现实空间和精神圣地。南宋末期,奉祠归里的真德秀延续了建州的理学传统。

关键词: 宫观官制度;建州理学文人群体;冲佑观;刘子翬;朱熹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141-10

宫观官制度为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是朝廷优待士人的政治政策和尊崇道教的宗教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宫观官又称祠官,分为宫观(副)使、判官、提举(点)、主管(管勾)、都监等类别,领任宫观官也称奉祠,一般允许任便居住。因最初规定年高硕望的重臣兼领神祠(宫观)而获取俸禄,狭义的宫观官制度又称祠禄制度^①。《宋史·职官志·宫观》载:“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时朝廷方经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观,以食其禄。”^[1]4080-4081 宋代宫观官始于真宗时期,设置初衷是“佚老优贤”,最初员数极少,王安石变法后,宫观官的员数大量增加,充任宫观官成为贬谪臣僚的辅助手段。南宋时期宫观官继续冗滥,成为很多士人抹不去的身份角色。朱熹曾言:“自王介甫更新法,虑天下士大夫议论不合,欲一切弹击罢黜,又恐骇物论,于是创为宫观祠禄,以待新法异议之人。然亦难得,惟监司郡守以上,眷礼优渥者方得

之。自郡守以下,则尽送部中与监当差遣。后来渐轻,今则又轻,皆可以得之矣。”^[2] 宫观官制度既是南宋反道学的工具,又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当时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已有学者从祠禄制度视角研究了以方信孺、刘克庄为核心的闽东莆田地区诗人群体^②,本文则以刘子翬、朱熹为核心的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宫观官身份在其交游活动、群体心态、诗文创作及理学传播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揭示宫观官制度在学术思想发展、地域文化建构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宫观官: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重要的身份标识

建州位居福建北部,古称建安,宋孝宗继位后,改为建宁府,下辖七县。《宋史·地理志·福建路》

收稿日期:2024-0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宫观官制度与文学研究”(17BZW097)。

作者简介:张振谦,男,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632)。

载:“建宁府,上,本建州,建安郡。旧军事,端拱元年,升为建宁军节度;绍兴三十二年,以孝宗旧邸,升府。……县七:建安、浦城、嘉禾(本建阳县……景定元年改今名)、松溪、崇安、政和、瓯宁。”^{[1]2208}宋代建州地区文化氛围浓厚,南宋胡寅《武夷桂籍记》云:“建州七县每应书者率四千而赢。崇安固里弦闻诵、家诗户书之邑也。”^[3]

建州自然山水以武夷山最负盛名。武夷山是道教第十六洞天,《云笈七签·洞天福地》载:“第十六武夷山洞,周回一百二十里,名曰真升化玄天,在建州建阳县,真人刘少公治之。”^[4]武夷山的命名源于仙人武夷君,据传汉武帝曾派人在此设坛奉祀武夷君。“武夷”二字最早出自《史记·封禅书》中的“武夷君用干鱼”^[5],陆游《游武夷山》诗云:“少读封禅书,始知武夷君。”^{[6]910}朱熹《武夷图序》亦云:“武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干鱼,不知果何神也。今有山名武夷,相传即神所宅。”^{[7]3716}武夷山道教文化至唐宋进入繁盛时期。武夷山历史上的第一座道观是冲佑观,又称武夷宫,其前身是唐天宝年间所建的“天宝殿”。五代闽王王审知将其修整,改名武夷观。南唐元宗李璟之弟李良佐入山访道,居留于此,保大二年(944年),“敕建州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武夷观可改赐‘会仙’为额”^{[8]67}。咸平二年(999年),宋真宗御书“冲佑”赐予会仙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真宗赐额“冲佑诏广观”。绍圣二年(1095年),因祷雨灵验,宋哲宗敕封武夷君为显道真人,并将“会仙观”改名为“冲佑观”。南宋时期,冲佑观成为武夷山最大的道观,也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宫观。刘子翬《修武夷冲佑观疏》云:“惟武夷之名山,有冲佑之秘宇。自昔秦汉而上,显著灵踪;由我祖宗以来,益严祀典。实四境瞻依之地,罄群心归恳之诚。流泽所加,无感不应。”^{[9]219}

武夷山冲佑观自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设置宫观官,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这一职位的道观^③。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曾领任冲佑观宫观官。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序》云:“与文公前后主管冲佑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当时名儒,是终守之世者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者也。”^{[8]10}该书卷16“武夷冲佑观主管”部分具体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其中理学家占据多数,除了“东南三贤”朱熹、张栻、吕祖谦外,还有刘子翬、叶适、彭龟年、魏了翁、林大中、曹彦约、黄度、陈舜申、傅自得、黄干、刘光祖、蔡幼学、张忠恕、刘崇之等。武夷山作为理学南传的第一站,声名远播,被后世誉为

“道南理窟”。“二程”的得意门徒、建阳人游酢和南剑州(今属福建)人杨时晚年均选择武夷山为终老之地,他们在此读书著文,传播学术,可视南宋建州理学的源头。程颢在洛阳送别杨时南归福建时说:“吾道南矣!”^{[1]12741}建炎二年(1128年),杨时“连章丐外,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1]12742}。杨时等人传道东南,既是理学重心由北向南逐渐迁移的过程,也是理学从河南洛学向福建闽学转化的过程。

武夷山不仅是道教名山,也是理学名山。南宋有不少理学家领任宫观官而退居武夷山附近,我们依据奉祠时间或生活时代顺序择要梳理如下。绍兴五年(1135年),建州崇安人胡安国提举江州太平观,归居故里,创立“武夷学派”,清人黄宗羲《宋元学案》卷34《武夷学案》记录有其谱系传承。胡安国之子胡寅于建炎三年(1129年)和绍兴八年(1138年)两次主管江州太平观,奉祠里居。绍兴十年(1140年),朱熹之父朱松因不附秦桧和议而被弹劾,他自请宫观官南归,主管台州崇道观。朱松《谢宫观启》云:“得郡自试,蒙恩不赀,乃犹沥恳而有言,亟获奉祠而自屏。扪心知幸,衔施不忘。”^[10]朱熹《皇考左承议郎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记载:“(绍兴)十年春,遂使言者论公独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为罪,而出之外郡。……公固不能复为之屈,遂自请为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讨寻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益虔。”^{[7]4535-4536}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再次请祠期间,卒于建安。

朱熹的宫观官生涯始于29岁差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十一月,朱熹以养亲为由请祠,其《申建宁府状》云:“泉州同安县主簿,到任四年,省罢归乡。偶以亲老食贫,不能待次,遂乞岳庙差遣。”^{[7]1144}十二月,朱熹获准监南岳庙。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朱熹秩满再请。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朱熹复监南岳庙。乾道元年(1165年),吏部侍郎陈俊卿推荐朱熹入朝,因其与主和派议论不合,再监南岳庙^{[11]341-344}。

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连上4道《辞免改官宫观状》,“(五月)己未,以迪功郎朱熹屡诏不起,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1]655}。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淳熙)二年,上欲奖用廉退,以励风俗,龚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进,除秘书郎,力辞,且以手书遗茂良,言一时权幸。

群小乘间谗毁,乃因熹再辞,即从其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1]12753}淳熙五年(1178年)十月,朱熹上《乞宫观札子》与《乞宫观状》再请祠。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乞宫观札子》云:“熹辄有诚恳,上渎钧听:熹昨蒙圣恩,差权发遣南康军事,已于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病陈乞祠禄,未蒙敷奏施行。今来在任已满十月,非久当书一考,实缘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以脚气痰饮发作无时,难以勉强在职。欲望朝廷特赐敷奏,改授祠庙差遣一次,使得杜门窃食,休养残废,庶几不至即日颠殒,不胜幸甚!”^{[7]1155}两个月后,朱熹又上《乞宫观状》与《乞宫观札子》,终于获准继续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宋史·朱熹传》载:“(淳熙)十年,诏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既而连奉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1]12756}淳熙十二年(1185年),朱熹秩满上《乞宫观札子》于朝再次请祠:“熹伏自顷岁罢官浙东,圣恩畀以祠禄,至今考满,家贫累重,未能忘禄,欲望特赐敷奏,更与再任一次。”^{[7]1170}四月,差主管华州云台观^{[1]804}。次年,朱熹主管南京鸿庆宫。淳熙十四年(1187年),周必大拜相,次年,朱熹除兵部郎官。然而,未及一年,他就以疾请祠,其《与周丞相书》云:“熹之衰病,首尾七年,去冬一二阴邪危恶之证虽已罢去,然腹心之患甫益坚牢,攻击万方,略无动意。……欲望丞相始终哀怜,少假钧陶之力,使得复供鸿庆守桃之役,则生托荣名,死题墓道,无复有遗恨。”^{[7]1372}七月,朱熹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他于是年作《戊申封事》云:

臣赋性拙直,不能随世俯仰,故自早年即自揣度决是不堪从宦。所以一向窃食祠禄,前后九任,岂不知有致身之义,亦非恬无济物之心,宁为退藏,盖以避祸。中间稍蒙任使,果然自速颠跻,七年之间,措身无所。今者一出,又致纷纭。幸赖圣明保全终始,增其禄秩,使足以免于饥寒,进其官资,使足以延于嗣息,此皆已非臣平生志望所及。天地之恩,不啻厚矣。^{[7]809}

朱熹认为自己由于性格原因选择奉祠退居以避祸,自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至淳熙十五年(1188年)先后9次领任宫观官,三次主管监潭州南岳庙,两次主管台州崇道观,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华州云台观、南京鸿庆宫、西京嵩山崇福宫各一任,长达18年。

淳熙十六年(1189年),光宗即位,改元绍熙,丞相留正举荐朱熹任江东转运使。然而,朱熹对仕宦并无从长计议,其《与留丞相札子》云:“熹虽出,终

不能久,近则半年,远则周岁,决须再有祈恳,复劳区处,不若及今便与祠禄之为便耳。”^{[7]1389-1390}果然,仅仅过了一年,他便因儿子朱塾去世再次乞祠,“时史浩入见,请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熹再辞,诏:‘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辞。漳州经界竟报罢,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辞,主管南京鸿庆宫”^{[1]12763}。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次年,宁宗立,朱熹“仍乞追还新旧职名,诏依旧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1]12767}。陈傅良此时所上《缴奏朱熹宫观状》云:“臣窃以为朱熹者,三朝故老,难进易退,二十余年,多任祠禄,今也欣慕圣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贺,以为得人。则进退之间,岂宜容易?未审何故,遂听退闲?”^[12]庆元元年(1195年),刘德秀、沈继祖先后向宋宁宗奏请禁止“伪学”,指斥朱熹道学为伪学,将宰相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和朱熹等59人列入“伪学党人籍”。次年十二月,朱熹遭党禁之祸,罢宫观祠禄,归居考亭,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宫观官生涯。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致仕,次年卒于家中。

南宋建州文人群体中还有不少人在理学上接踵朱熹,而且长期领任宫观官。崇安人刘珙(1132—1185),字平父,号七者翁,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以祖母卓氏在堂,3次上书乞祠,得监潭州南岳庙,在武夷山筑“七者之寮”,常与朱熹、胡宪诸贤唱和,并将其父刘子翬的诗文汇编整理成《屏山集》20卷传世。建阳人游九言(1142—1206),字诚之,号默斋,庆元二年(1196年),以不便养亲丐祠里居。长乐(今属福建)人黄干(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23岁前往崇安师从朱熹,后为其婿,嘉定十一年(1218年),以衰病辞官,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专事讲学。《宋史·黄干传》载:“(黄)干遂归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借邻寺以处之,朝夕往来,质疑请益如熹时。俄命知潮州,辞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宫,逾月遂乞致仕,诏许之,特授承议郎。”^{[1]12782}建安人袁枢(1131—1205),字机仲,绍熙元年(1190年)提举太平兴国宫返归故乡,庆元元年(1195年),再次提举太平兴国宫,此后闲居家乡10年,直至去世。《宋史·袁枢传》载:“寻为台臣劾罢,提举太平兴国宫。自是三奉祠,力上请制,比之疏傅、陶令。开禧元年,卒,年七十五。”^{[1]11936}蔡幼学(1154—1217),字行之,温州(今属浙江)人,历任

泉州、建宁和福州知府。庆元二年(1196年),时任福建提举常平的蔡幼学多次向奉祠闲居建阳的朱熹求问为政之道,由于当时朝廷禁用“伪学”之党,他因此被诬为“早为伪学,巧取伦魁,持节闽部,全不事事”^[13]而被弹劾罢官,领任宫观官而客居建州长达8年之久。《宋史·蔡幼学传》载:“时韩侂胄方用事,指正人为‘伪学’,异论者立黜。幼学遂力求外补,特除提举福建常平。……时朱熹居建阳,幼学每事咨访,遂为御史刘德秀劾罢,奉祠者凡八年。”^[1]¹²⁸⁹⁷⁻¹²⁸⁹⁸建阳人刘崇之(1154—1210),字智夫,嘉泰元年(1201年)和嘉定二年(1209年),两次请求奉祠,分别主管华州云台观和武夷山冲佑观,晚年奉祠家居,时长共计6年。

南宋时期围绕武夷山形成的建州文人群体,其成员多为理学家,是南宋理学诗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学诗人政治上力主抗金,反对和议退让、苟且偷安,成为一股对朝政有很强冲击力的政治力量。由于与秦桧、韩侂胄等奸相奉行的求和投降政策相悖,他们往往被朝廷以领任宫观官的名义排挤出朝,里居建州。建州因此成为南宋士人闲居之地的代称,正如陆游于淳熙六年(1179年)作于建安的《送钱仲耕修撰》诗中所云:“殷勤为报中朝旧,睡足平生是建州。”^[6]⁸⁵⁹在奉祠期间,他们以理学来传承文脉,以爱国为精神契合点,以武夷山水为歌咏对象,在武夷山一带形成了具有较大影响的建州文人群体。武夷山既是杨时、游酢、胡安国等福建籍大儒促使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也是朱子理学诞生、发展、成熟的大本营。

二、刘子翬领任宫观官时期的创作与讲学

南宋初期,最早领任宫观官而归居建州的是著名理学诗人刘子翬。刘子翬是朱熹的理学老师,在文学上颇有造诣,现存诗歌660余首。钱钟书曾说:“假如一位道学家的诗集里,‘讲义语录’的比例还不大,肯容许些‘闲言语’,他就算得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例如朱熹。刘子翬却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并非只在道学家里充个诗人。”^[14]

刘子翬(1101—1147),字彦冲,自号病翁,世称屏山先生,建州崇安人。其父刘鞅在靖康之难时任京城四壁守御使,誓不仕金,自缢殉节。刘子翬归里守制期满,南宋朝廷任命其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绍兴元年(1131年),其妻陆氏病逝,次年,兴

化任满后,他因病请祠,以右宣教郎的名义主管冲佑观,隐居崇安屏山之下。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7载:“绍兴二年八月……右宣义郎通判兴化军刘子翬主管建州武夷山冲佑观。子翬,鞅少子,有学行。以毁瘠,不堪吏责,弃官去,读书武夷山中。”^[15]刘子翬在兴化军通判任上政绩突出,本可连任,但因父亲罹难,哀伤过度而致疾,不得不通过奉祠度过人生的最后17年。《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11《刘子翬病翁先生》载:

倅兴化军,秩满,以最闻。诏还莅故官。先生始以哀毁致疾,自以不堪吏责,遂丐祠主管武夷冲佑观以归,十有七年,四为崇道祠官。^[16]
《宋史·刘子翬传》也载:

子翬始执丧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责,辞归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1]¹²⁸⁷¹

相对于短短3年的仕宦生涯,归隐屏山的这17年可谓刘子翬生命历程中时段最长、分量最重的时期。刘子翬主管冲佑观任满后,又连续4次领任台州崇道观宫观官。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云:“如是者十有七年,四为崇道祠官,累阶右承议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绍兴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7]⁴²¹³刘子翬接到宫观官任命后,写有诗篇表达当时的感受。首次领任宫观官时,刘子翬作七言绝句《得冲佑命》云:“几年归梦水云间,猿鹤重寻已厚颜。惭愧君恩犹窃禄,官衔新带武夷山。”^[17]²¹⁴¹⁵从中可见他重回故乡时那种喜悦且略带愧疚的心情。此后刘子翬主管台州崇道观,又作《得天台命二首》诗云:

奉祠得请向天台,清梦先寻紫翠堆。借问刘晨今在否,云间应见耳孙来。

暖风环佩满芳洲,贝阙珠宫忆旧游。此日刘郎心似水,桃花空绕暮溪流。^[17]²¹⁴²⁹

他在诗中巧用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的典故,言说自己再次领任宫观官的平静心态。随着国势的日益衰微和自己年龄的增长,诗人远大的政治抱负已消磨殆尽,正如其《转秩奉祠蒙朝佐子静庆以四六戏裁长句为谢》所云:“一岭无情阻面谈,鸣翰忽堕得双函。抽黄对白虽云妙,刻朽嘘枯祇益惭。小转只缘官带右,雄飞无复梦图南。借留赖有天台侣,老矣真成七不堪。”^[17]²¹⁴⁵⁰他在这里借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七不堪”来陈述自己不能出仕的原因。

刘子翬领任宫观官期间,读书创作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活动。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

云：“先生始以衰毁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复堪吏责，遂丐闲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以归。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园林水石之胜，于是俯仰其间，尽弃人间事。自号病翁，独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无一言。意有所得，则笔之于书，或咏歌焉以自适。”^[7]⁴²¹²

刘子翬接到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之命后，作《归田》诗云：

声色家有阱，轩裳仕之囚。冥行不知迷，今将返吾辀。爱慕洗余习，清虚乐孤游。亭亭隐仙岩，迎人入双眸。稻色黄莽莽，溪光碧油油。佳树残照满，高穹乱云流。乍参樵牧群，辞气不婉柔。性有书史癖，时逢甲兵休。斯怀悦遂全，曩志不必酬。^[17]²¹³⁵⁹

诗中表达了作者对奉祠后闲云野鹤式生活的想象与向往。“时逢甲兵休”即其《送张当世序》所云：“（绍兴二年）壬子春，灵旗大伐，冲逐荡拓，寇乃平。”^[9]¹⁵²归隐之后，他在多篇作品中表露心无旁骛地读书治学，如“老矣惟书爱未消，喜闻新塾出尘嚣”（《题吴若愚一经堂》），“病间欲疏酒，老便惟读书”（《致中晚集》），“只应心醉六经醇，自是陶陶晋魏人”（《致中诗戏论诗棋酒辄次原韵》）等。

刘子翬人生的最后 17 年闲居崇安，诗歌中更多地书写山林田园、寄赠友朋，透露出他对时局的灰心，表现出隐者的姿态。如其《屏迹》诗云：“屏迹山樊避世喧，晚风落日静柴门。寒泉绕竹通幽圃，小径穿田入别村。散策微吟霜叶脱，钩帘宴坐碧云翻。闲中兴味知何晚，绝口名途不更言。”^[17]²¹⁴²⁴其《桃源》诗云：“桃花深处蜜蜂喧，山近前峰鸡犬村。若有胡麻泛流水，武夷转作武陵源。”^[17]²¹⁴⁵⁸他将武夷山当做桃花源，游览风景秀丽的武夷山成为其晚年生活中放松、愉悦心情的重要方式。刘子翬《病中追赋武夷》诗云：“建水日夜浅，清滩自迢迢。渔舸愕已无，忽点净练遥。老身寄其上，兀若栖危苕。松风知我狂，随舷助倾摇。探幽神益新，得快意自消。长林翠洞口，微云粉山腰。那知碧虚远，一苇卧可超。不须换吾骸，吾慵登岩嶢。病中追余观，所得绝富饶。”^[17]²¹⁸³⁹其《绝句》中也有类似表达：“喜闻归骑已扬镳，载酒相迎不惮遥。我是武夷东道主，便同蜡屐上岩嶢。”^[17]²¹⁴²⁵

刘子翬这一时期所作诗篇大部分充满着田家浓郁的生活气息，表现出对和平宁静田园生活的留恋与喜爱之情，如“长空淡淡如云扫，暮过田家风物好。耕犁倚户寂无人，饥牛卧啮墙根草”（《田家》）。

处于人生晚年的刘子翬在诗中反复表明自己的退隐之乐与恬淡自得的平和心态，如“野墅惊秋晚，残年匆匆过。海潮通井浅，林日到窗多。酒尽邻翁饷，诗成稚子哦。人生行乐耳，轩冕奈余何”（《野墅》），“人间过眼事如许，何用封侯羨芻豢”（《次韵六四叔村居即事十二绝》其十），“宦游若胜归田乐，肯把轩裳换一犁”（《筑室》）。

刘子翬虽然归隐山林，但由于担任宫观官而领取朝廷俸禄，内心深处仍始终牵挂着国家朝堂。其《负暄》诗云：

宵寒卧增裯，昼寒起增衣。何如负暄乐，高堂日晖晖。引光靡尽辟，追影榻屡移。妙趣久乃酣，瞑目潜自知。初如拥红炉，冻粟消顽肌。渐如饮醇醪，暖力中融怡。欠伸百骸舒，爬搔随意为。稍回骄佚气，顿改酸寒姿。薰然沐慈仁，天恩岂余私。愿披横空云，四海同熙熙。矫首望扶桑，倾心效园葵。^[17]²¹³⁵⁶

此诗的诗题出自《列子·杨朱》：“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缊縕，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纁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负暄”作为向君王敬献忠心的典实，在这首诗中用来言说诗人自己因身体衰病而处境窘迫的时候，得到了宫观官制度的帮助和救济，改变了寒酸的生活状态，拥有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他的内心因此充满了暖意和感恩，并在结句发出杜甫“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式的忠诚报恩的肺腑之言。

刘子翬领任宫观官期间，讲学授徒是其最重要的日常活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56 载：“子翬既奉祠，尽弃人事，独居一室，意有所得则笔之于书，四方学者多从之。”^[18]由于身体疾病所限，不能直接为朝廷效力却获得祠禄，他内心十分愧疚，“未能医国惭君赐，旧书且读蝇头字”（《鹅峰居士以地黄遗病翁，因为作引》），于是，他将精力倾注在广收门徒、兴办地方教育上。

刘子翬回乡后，即着手扩修祖上留传的刘氏家塾，次年建成。明人黄仲昭编纂的《八闽通志》卷 73 记载，刘氏家塾中有六经堂，家园有早赋堂、悠然堂、横秋阁、凉阴轩、山馆、万石亭、意远亭、怀新亭、百花台、醺醺洞、海棠洲、莲池、橘林、桂岩、宴坐岩、醒心泉、南溪，凡 17 景。刘子翬各赋诗纪胜，并且延请当地知名学者刘勉之、胡宪为塾师，在此开坛讲学，广招弟子，传道乡里。六经堂是生徒受学之处，刘子翬

《示六经堂学者》云：“此堂何有，维经与史。隐索周施，于兹备矣。诵书琅琅，其神乃扬。杂虑横心，圣言则忘。讲书默默，精义乃得。”^{[9]208}南宋初期，建州生徒在六经堂学成而科举及第者不在少数。刘子翬《寄如愚、珙二首》曾云：“射殿遥闻驻六飞，天颜咫尺引儒衣。吾家亦有肱传喜，叔侄联名赐第归。”“雁塔蟾宫尽假途，要须行实副名誉。六经堂上归来日，饱读平生未见书。”^{[17]21442}除刘氏叔侄外，朱熹、刘珙、魏掞之、方士繇、黄铢、黄子衡、詹体仁、魏元履、李从礼、刘懋、欧阳光祖等人均从学于此。其中，朱熹最为著名。

绍兴十三年(1143年)，因遭秦桧之党弹劾而奉祠归闽的朱松去世，曾托孤于闲居建州崇安的好友刘子翬、胡宪和刘勉之三人。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云：

盖先人疾病时，尝顾语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熹饮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则奉以告于三君子而禀学焉。^{[7]4211}

刘子翬、胡宪和刘勉之皆因反对秦桧和议而归隐武夷地区，被称为“武夷三先生”。朱熹遵从其父遗命，投奔刘子翬，刘氏待其如子侄，为其取字“元晦”，与刘勉之、胡宪一起教授他修习理学。此后，年方14岁的朱熹就在此生活、学习。胡宪(1084—1162)，字原仲，自幼从乡贤胡安国学，人称籍溪先生，曾任建州教授、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辞官，主管台州崇道观而归里。刘勉之(1089—1149)，字致中，号草堂，世称白水先生，自绍兴三年(1133年)开始，他在建阳近郊构建萧屯别墅，“及至家，即邑近郊结草为堂，读书其中，力耕自给，澹然无求于世。与胡宪、刘子翬相往来，日以讲论切磋为事。绍兴间……勉之知不与桧合，即谢病归。杜门十余年，学者踵之，随其材品，为说圣贤教学之门及前言往行之懿”^{[1]13463}。

绍兴十七年(1147年)，刘子翬卧病不起，朱熹侍奉左右。刘子翬去世前夕，曾作诗《病中赏梅赠元晦老友》云：“梅边无与谈，赖有之子至。荒寒一点香，足以酬天地。天地亦无心，受之自人意。韬白任新知，风味要如此。”^{[17]21389}从中可见他对刚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的朱熹寄予厚望，希望他此后为官、为人均要保持梅之高洁品格。

刘子翬去世15年后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朱熹在《伏读二刘公瑞岩留题感事兴怀至于陨涕追次元韵偶成二篇》其二云：

投绂归来卧赤城，家山无处不经行。寒岩解榻梦应好，绝壁题诗语太清。陈迹一朝成寂寞，灵台千古自虚明。传来旧业荒芜尽，惭愧秋原宿草生。(自注：右怀病翁先生作。翁领崇道祠官，故有“赤城”之句。)^{[7]169-170}

诗题中的“二刘公”指刘子羽、刘子翬兄弟。该诗为追怀刘子翬而作。因刘子翬四度主管台州崇道观，崇道观在台州天台县赤城山，故有首句之说。由此可见朱熹与二刘之间的密切关系。

刘子翬自绍兴二年(1132年)领任宫观官归隐屏山后，积极扩修刘氏家塾，与胡宪、刘勉之等人讲学论道、诗酒酬唱，为南宋初期建州学术的兴盛和文人群体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淳祐二年(1242年)，宋理宗为褒扬刘子翬的教育功绩，敕建屏山书院，门额为门人朱熹手书^[19]。刘子翬死后，朱熹视其为风骨楷模与精神标杆，在《书屏山先生文集后》云：“窃以为先生文辞之伟，固足以惊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学，静退之风，形于文墨，有足以发蒙蔽而销鄙吝之萌者，尤览者所宜尽心也。”^{[7]3863}巧合的是，朱熹一生也长期奉祠，闲居武夷山，弘扬理学、传道有声。

三、朱熹奉祠期间对武夷精舍的营建、书写及其影响

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幼时随父朱松辗转寓居多处，绍兴十年(1140年)，迁居建州建安环溪精舍。三年后父卒，被托孤于刘氏兄弟，遂与母移居崇安，受学于“武夷三先生”。刘子羽为其筑室“紫阳楼”，朱熹在此定居40年。淳熙十年(1183)后，朱熹常住崇安武夷精舍，绍熙五年(1194)搬至建阳考亭，度过晚年。朱熹享年71岁，19岁中举，仕于外者9年，立于朝者仅46日，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建州武夷山的山野之间，与友人寄情山水，著书立说，讲学传道，过着闲适自得的生活。在这期间，朱熹请祠极为频繁，长期领任宫观官。

朱熹20余年的奉祠经历对其人生思想、讲学论道、交游酬唱、文学创作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答韩尚书书》中自言：

熹狷介之性，矫揉万方而终不能回，迂疏之学，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笃，以此自知决不能与时

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来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愿欲者,不过修身守道,以终余年,因其暇日,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义之所在,既以自乐,间亦笔之于书,以与学者共之,且以待后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实无毫发余念也。〔7〕¹²⁹¹

朱熹归居建州期间,共创建了4所书院,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书堂、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其中,武夷精舍使用时间最长、招收生徒最多,对朱子理学体系建构的作用最为关键,对它的营建和书写为我们管窥朱熹与宫观官制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

武夷精舍正式营建始于淳熙十年(1183年)正月,时任浙东常平茶盐使的朱熹因弹劾贪官——台州知府唐仲友而得罪左相王淮,被污蔑和排斥,责授主管台州崇道观,辞官归里。朱熹奉祠回乡后,便亲自筹划、营建武夷精舍。建宁知府韩元吉《武夷精舍记》中对此有明确记载:

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词哦而歌之,得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中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余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遂赋祠官之禄,则又曰吾今营其地,果尽有山中之乐矣。盖其游益数,而于其溪之五折负大石屏,规之以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茅草,仅得数亩,面势幽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带,若阴相而遗我者。使弟子辈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20〕

此记作于淳熙十年(1183年)八月,主要讲述武夷山的地理环境及武夷精舍的布局,同时肯定朱熹效仿孔子言行,揭示武夷精舍“学行其乡,善其徒”的创办目的。其实,朱熹营建武夷精舍的想法可追溯至乾道五年(1169年),当时他为母亲祝氏丁忧而家居,其作于淳熙十年的《行视武夷精舍》诗句“胡然闭千载?逮此开一旦”后自注:“峰下小山重复,中有平地数十丈,乔木长藤,茂林修竹交相蔽隐。旧无人迹,乾道己丑,予舟过而乐之。及今始能卜筑,以酬曩志。”〔7〕⁶⁵⁹

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领任武夷山冲佑观宫观官期间,与妹夫刘彦集、隐士刘甫等人共游武夷山时作《游武夷以“相期拾瑶草”分韵赋诗得“瑶

字》:“秋声入庭户,残暑不敢骄。起趁汗漫期,两袂天风飘。眷焉此家山,名号列九霄。相与一来集,旷然心朗寥。栖息共云屋,追寻唤渔舸。一水屡萦回,千峰郁嵒峩。苍然大隐屏,林端耸孤标。下有云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英琼瑶。茅茨几时见,自此遗纷嚣。”〔7〕³⁴⁴“相期拾瑶草”出自杜甫《赠李白》中的诗句“亦有梁宋游,相期拾瑶草”,李、杜相遇,因不得意遂生求仙之念。朱熹借此表达自己的出世之思,从该诗后半部分来看,朱熹营建武夷精舍之思已越发浓厚和清晰。

武夷精舍大约一半的建筑是以道教宫观为基址的。朱熹在创建时,在石门西边建有专供道士居住的“寒栖馆”。“石门之西少南,又为屋以居道流,取道书《真诰》中语命之曰‘寒栖之馆’。”〔7〕⁶⁶¹《真诰》卷六载:“太虚真人曰: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学道者。寒栖山林者,益当以为意。”〔21〕朱熹《寒栖馆》诗云:“竹间彼何人?抱甕靡遗力。遥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7〕⁶⁶³诗中塑造了此时朱熹安于拙朴生活的自我形象,“抱甕”语出《庄子·天地》,后形容保持本心,安于拙陋的纯朴生活。除寒栖馆外,武夷精舍还有仁智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晚对亭和铁笛亭等,这些构成了武夷山享誉盛名的建筑群。这些建筑的布局安排如下:武夷精舍坐落在五曲溪畔,隐屏峰两峰相抱之中。精舍主房为仁智堂,堂左边为朱熹的卧室——隐求室,寓示隐退山林、求真返朴之意,右边是止宿寮,用来接待朋友。隐屏峰左麓有石门坞,内建一排房屋,为弟子们的宿舍,取《学记》“相观而善之谓摩”之义而名之观善斋。在观善斋前,晚对亭和铁笛亭对称而立。

武夷精舍落成之后,朱熹作有《武夷精舍杂咏》12首诗,分别对精舍、仁智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钓矶、茶灶、渔艇进行吟咏,表现了诗人隐居求志的高怀与雅趣。如其一《精舍》云:“琴书四十年,几做山中客。一日茅栋成,居然我泉石。”〔7〕⁶⁶²诗中表达了诗人自14岁定居崇安至今整整40年与武夷山结下的不解之缘。朱熹《行视武夷精舍》诗云:“暂游意已惬,独往身犹绊。珍重舍瑟人,重来足幽伴。”自注:“已约初夏与同志皆往游集。”〔7〕⁶⁶⁰他在武夷精舍建成的短短数月内创作了大量作品,用来介绍其建筑分布、名称来源及功能用途等信息,由此阐释和赋予武夷精舍的价值和意义,表明自己的生活心态,构建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武夷精舍的建造为仕途失

意的朱熹提供了寄托身心的私人空间和怡情养性的精神家园。在这一独特空间中,他既可以著书立说、教学育人,又能够栖息心灵、陶冶自我,还可以寄情山水、体悟天道。

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十六日,武夷精舍正式竣工,朱熹即移居于此,其《武夷精舍杂咏》序云:“经始于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来居之。四方士友来者亦甚众,莫不叹其佳胜,而恨它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7]⁶⁶²此后,四方名流纷纷亲至其地或遥以诗文相贺。先是建州理学家蔡元定(字季通)、吴楫(字公济)来到武夷精舍,后至武夷山冲佑观岁寒轩聚会唱酬。朱熹有《次公济精舍韵》《奉同公济诸兄自精舍来集冲佑之岁寒轩因邀诸羽客同饮,公济有诗赠守元章师因次其韵》诗唱和。长期师事朱熹的方士繇和史学家袁枢均作有《武夷精舍十咏》。已经致仕归居莆田故里的陈俊卿寄题武夷精舍诗来,朱熹有《伏蒙致政少传相公宠赐寄题武夷精舍诗一首,拜受捧读,不胜仰叹,无以自见,区区感幸之诚,辄继高韵,缮写拜呈,冒渎威尊下情恐悚之至》诗和之。丘密也对朱熹《武夷精舍杂咏》组诗进行了追和,他读罢朱熹《精舍》后,产生跟随朱熹逍遥其中之念,其《和朱子武夷杂咏十首·精舍》诗云:“我读精舍篇,梦作山中客。从公夜不眠,寒灯歌白石。”^[17]²⁸⁹³⁴

陆游、杨万里等文坛巨擘也均有对武夷精舍的题诗。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发现了武夷精舍之于朱熹的重要意义,对他能够在其中安心读书治学予以肯定。陆游《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五首其一云:“先生结屋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6]¹²⁰¹袁枢《武夷精舍十咏·仁智堂》亦云:“此身本无累,动静随所寓。结庐在岩谷,自适山水趣。”^[17]²⁷⁷¹⁸他们以这一建筑空间为触发点,在融入自身经历与感受的同时,强化了朱熹当时的思想和心态,体现了理学家安贫乐道的崇高精神境界,赋予了武夷精舍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南宋文士吟咏武夷精舍的一系列作品中,逐渐塑造了领任宫观官时期的朱熹形象。袁枢《武夷精舍十咏·隐屏精舍》云:“有怀武夷仙,相期苍翠间。”^[17]²⁷⁷¹⁹杨万里《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十二咏·精舍》云:“忆我南溪北,千岩万壑亭。妒渠紫阳叟,诧杀一峰青。”^[22]¹⁴⁶⁴吕天泽《题武夷》诗云:“书林追慕紫阳翁,出入尝沾教雨中。缅仰高山难企及,大开茅塞怎能通。”^[17]³¹²⁹²陈宓《闰月五日题

武夷》三首其一云:“武夷精舍果何如,名字流传动八区。大隐山前溪五曲,一间茅屋与谁居。”^[17]³⁴⁰⁴³白玉蟾《题精舍》云:“到此黄昏飒飒风,岩头只见药炉空。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晦翁。”^[17]³⁷⁵⁹³

朱熹《武夷精舍杂咏》组诗的最后一首是《渔艇》:“出载长烟重,归装片月轻。千岩猿鹤友,愁绝棹歌声。”^[7]⁶⁶⁴渔艇是连接武夷精舍与外界的交通工具,杨万里《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十二咏·渔艇》诗云:“精舍何曾远?只在九曲北。渔艇若不来,弱水万里隔。”^[22]¹⁴⁶⁶朱熹以武夷精舍象征归隐、轻松纯洁,以外界隐喻出仕、负重迷茫,在他的心中,这两个空间正是出处、仕隐的代表,正如丘密追和此诗所云:“世路风波恶,扁舟去住轻。中流发清唱,千古有遗声。”^[17]²⁸⁹³⁵朱熹援引孔稚珪《北山移文》对假隐的嘲讽,以往返武夷山九曲溪途中清新自然的棹歌来消弭胸中的愁情。

淳熙十一年(1184年)二月,朱熹携友人学子游武夷山九曲溪,作千古名篇《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组诗(后来简称《武夷棹歌》或《九曲棹歌》)。这是歌咏武夷山水的经典之作,也是解读朱子义理的重要材料,兼具游乐诗和说理诗双重文本^④。朱熹门人及友人大量和作与仿作,在当时和后世广为流传。时任建宁知府的韩元吉最早唱和该组诗,今仅存1首《次棹歌韵》。南宋文人和韵之作还有白玉蟾《武夷九曲棹歌》10首、方岳《又和晦翁棹歌》10首、欧阳光祖《和朱元晦九曲棹歌》2首、留元刚《武夷九曲棹歌》7首。和作之外,《武夷棹歌》在宋代的仿作也颇多,如白玉蟾《九曲棹歌》、蒲寿晟《重游武夷偶成棹歌一首》等。其中成就较高的是绍熙三年(1192年)辛弃疾路经崇安至武夷精舍与朱熹相会时所赋的《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其九云:“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23]辛弃疾将曾担任侍讲的朱熹称为“帝王师”,昔日的“帝王师”现在却领任宫观官,只能吟诗垂钓、餐霞饮露,他期望有朝一日“西伯”前来将其诚邀归朝。

武夷精舍也是朱熹最终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并以它为教材实行教育实践的著名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熹在武夷精舍广收门徒,培养了大批学生,逐渐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派。武夷精舍也因此成为理学教育的中心,蔡元定、刘燾、黄干、詹体仁、游九言、李方子、方士繇、陈

淳、蔡沈、窦从周、张巽、李閔祖等人,都曾就学于武夷精舍。当时或稍后,建州当地为数不少的理学家纷纷仿效朱熹,相继在武夷山中、九曲溪旁构筑读书讲学之室,如游九言的“水云寮”、刘燊的“云庄山房”、蔡沈的“南山书院”等,武夷山遂成为当时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阵地名噪一时。南宋理学家张栻曾云“当今道在武夷”^[1]¹²⁰⁵³。由于武夷精舍之于朱熹的重要意义,它被塑造成为一个现实中可以触及而又与理想家园相符的精神圣地。

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提举南京鸿庆宫,其《拜鸿庆宫有感》诗云:“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7]⁶⁷⁹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内有宋神宗御容绘像,但此时这里已沦陷为金国的统治区,宋人无法前往,朱熹晚年奉祠期间仍然挂念着沦陷的中原故土。正如清人王懋竑所言:“先生守南康,使浙东,始有以身殉国之意,及是知道之难行,退而奉祠,杜门不出,海内学者尊信益众。然忧世之意未尝忘也。”^[24]

回顾朱熹的一生,宫观官制度为他提供了物质生活基础和充裕的时间,使他能够长期在武夷山自由生活、交游唱和、专心讲学和创作。尤其是淳熙十年(1183年)至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武夷精舍的8年,其学术思想和生活心态均臻于成熟。他通过对武夷山水的描绘来展现闲适的心态,创作了800余首诗,占其诗歌总数的半数以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宫观官制度为朱熹理学杰出地位的奠定与文学创作成就的取得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撑和制度保障,他奉祠期间营建和书写的武夷精舍可以视为其理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发生联系的重要现实空间和精神家园。

余 论

朱熹逝世10年后的嘉定二年(1209年),朝廷加封其谥号为“文”,称“朱文公”,并将其领任宫观官闲居建州期间完成的学术著作立于学馆,成为官方法定的读本。宋宁宗“嘉定更化”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有利于理学的复苏,为理学的自由发展赢得了—个宽松的环境。理宗即位后,崇信程朱理学,并请朱熹再传弟子、建州浦城人真德秀兼经筵侍讲。真德秀对南宋后期理学的传承和发扬贡献甚大。《宋史·真德秀传》云:“自侂冑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

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1]¹²⁹⁶⁴宝庆元年(1225年),真德秀因得罪权相史弥远,被提举玉隆万寿宫,落职闲居。其《辞免除职宫观状》云:“今月初三日,恭准省札,勘会已降指挥,真某除职,与宫观。九月二日三省同奉圣旨,除焕章阁待制、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任便居住,札送某者。”^[25]他奉祠退归故里,一边步趋朱熹,阐发正心诚意的理学义理,一边读书创作。清人真采所编《真西山年谱》记载:“公既归浦城,以田易梦笔山地数亩,构堂于山之麓,日与门人刘克庄、汤汉、徐华老辈修《读书记》。”^[26]此事应发生于宝庆二年(1226年)至绍定元年(1228年)刘克庄知建阳县期间,他创立文公祠,主祀朱熹,这是朱熹享有专祠奉祀的开端。刘克庄后来在其《通两浙运使朱都承》中回忆说:“昔过考亭故居,尝登武夷精舍,徘徊如至阙里,梦寐想见文公。岂知高山仰止之邦,乃为有锦使制之地。”^[27]从中可见真德秀及其生徒刘克庄等人在建州的生活状态和行为轨迹。

综上所述,宫观官制度为建州地域文人聚合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和延续。这一文人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里籍建州,他们交游、创作、传播理学的地理空间主要是武夷山及其周围地区。冲佑观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宫观官的道教官观,刘子翬、朱熹等人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的经历,在其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中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记。作为宫观官的刘子翬和朱熹,在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离合聚散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在宫观官制度庇护之下开展了大量的文学学术活动,从中可以管窥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文人心态。

注释

①关于该制度的研究,可参阅以下成果: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台北:学生书店,1978年;金圆《宋代祠禄官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白文固《宋代祠禄制度再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6期;刘文刚《论宋代的宫观官制》,《宋代文化研究》第七辑,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汪圣铎《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张振谦《北宋宫观官制度流变考述》,《北方论丛》2010年第4期。②侯体健:《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③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自今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灵仙观置管干或提举、提点官。”见《宋史》卷17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80—4081页。④具体论述详见王利民:《从〈武夷棹歌〉论

朱熹诗歌的双重文本》,《东方丛刊》199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3076.
- [3]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9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86.
- [4] 张君房.云笈七签[M].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614.
-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86.
- [6]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7] 朱熹.朱熹文集编年评注[M].郭齐,尹波,编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
- [8] 董天工.武夷山志[M]//藏外道书:第33册.成都:巴蜀书社,1994.
- [9]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9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0]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88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06.
- [11]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2]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67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97-298.
- [13] 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039.
- [14] 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2.
- [15]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56.
- [16] 朱熹,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2033.
- [17]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96.
- [19] 危继良.屏山志略:附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34.
- [20]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16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26-227.
- [21] 陶弘景.真诰[M].赵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100.
- [22] 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3] 辛更儒.辛弃疾集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74.
- [24] 王懋竑.朱子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1.
- [25]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1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430.
- [26] 真采.真西山年谱[M]//吴洪泽,尹波.宋人年谱丛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7495.
- [27] 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1:7635.

The Palace Official System and Literati Group of Neo-Confucianism in Jian Zhou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Zhenqian

Abstract: The palace official system was unique to the Song Dynasty. The palace official system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not only a tool for anti-Daoism, but also provide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which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academic thought and literary cre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at that time. Most scholar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d the experience of leading palace officials to live in their hometown, which undoubted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literature. The palace official system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and condition for the convergence of literati in Jian Zhou, 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literati group in Jian Zhou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ongyou Temple was the only temple with a palace official in Jianzhou area. Wu Yi Mountain, a famous Taoist mountain, was the transfer station for the southward movement of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base camp for the birth,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Zhu Xi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st 17 years of his life, Liu Zihui attended temple five times and lived idle in Chong An, Jian Zhou.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lecturing were two of his most important daily spiritual activities. Zhu Xi led the palace official for a long time in his life, totaling more than 20 years. The palace official system provided economic support and time guarantee for Zhu Xi's outstanding position in Neo-Confucianism and literary creation achievements. The Wu Yi Jing House built and written by Zhu Xi during his temple period can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realistic space and spiritual holy place where the two were related. At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en Dexiu back hometown continued the tradition in Jianzhou region.

Key words: palace official system; Jian Zhou literati group of Neo-Confucianism; Chongyou Temple; Liu Zihui; Zhu Xi

责任编辑:采薇